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 127 期 (总第 377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2 年 4 月 30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8961988622

编者按：4 月 26 日下午，市委书记赵鹏 10 天之内再次检查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他强调，要着力培育和塑造城市个性和特色，做足水绿文章，精心打造“百河之城”、“百桥之城”、“百园之城”，努力提升城市功能和品位，改善人居环境。要言之，赵书记就是要上上下下精心打造盐城的地方名片。盐城的名片还有海盐文化，还有铁军文化，还有盐城“二乔”，还有淮剧和杂技……我们为之自豪。

地方名片是一个地方文化功能面貌的典型概括，既展现一个地方的文化风貌，更凸显一个地方的价值底蕴。这张名片凝结的是一种无形的竞争力，累积的是地方最为重要的资本。因为这张名片，这个地方变得更加生动、多彩，令人记忆深刻，激发向往，可以使这个地方具有更加强健的竞争力，可以助推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标志性的名片，它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符号，是一个地方最具体、最直接、最显著的品牌。有人说，好的民风是一个地方最好的名片。有人说，贫困地方，优化发展环境、改善百姓生活，就是最重要、最好的地方名片。有人说，要重视打造地方精神名片，弘扬每个地方独特的精神文化物质，从而凝心聚力、励精图治、共谋发展……关于地方名片，就像文化的概念那样，见仁见智，百舸争流。

本刊特此推出《地方名片》专题，供各位领导参考。其他栏目推荐的文章相信也会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要目

●本期专题/地方名片

各地评选“精神名片”关注地方文化内涵

城市靠电影、宣传片打造名片

湖北襄阳：亮出“见义勇为”地方名片

浙江绍兴：激活文化资源 打造城市名片

青岛即墨市：“一村一品”打造村庄产业“名片”

●文化纵横/精制文化惠民“淮扬盛宴”

●新闻导航/人民日报在薄熙来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历史深处/关于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的新考证

●本期专题/地方名片

各地评选“精神名片”关注地方文化内涵

北京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郑州的“博大、开放、创新、和谐”，长沙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近年来，中国地方省份和城市兴起一股“精神名片”评选、发布的热潮，各式各样的“地域精神”表述语新鲜出炉。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湖南，这个中国内陆省份从2月1日起开始“湖南精神”的征集。3月21日，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精神提炼语‘4选1’活动”发布会上，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志初介绍说，前期“10选1”活动共有578万余人次参与。

“短时间内有接近600万人参与投票非常不容易，这充分反映了社会各界人士高昂的参与热情。”张志初说。

对于开展这项活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认为，湖湘从来重精神，以“湖南精神”征集提炼为例，有利于进一步形成湖湘文化的共识，让三湘儿女拥有更加坚定的价值追求，筑牢强省之魂，彰显湖南的魅力。

事实上，这种“地域精神”的评选、发布活动近年来有方兴未艾之势。据粗略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已有20多个省市推出了各自的“地域精神”表述语。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北京精神”表述语的评选。去年11月，经过一年多提炼和290多万群众投票，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正式向社会公布了由“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内容的“北京精神”表述语。

从今年开始，北京市将开设小学、中学“北京精神”地方课程，在青少年中培养和弘扬“北京精神”。而在2月举行的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中，“北京精神”与空气质量监测等当下热门话题同时印上考卷。

有分析人士认为，“地域精神”评选活动的兴起，显示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在多年来注重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精神名片”带来的独特效应。特别是城市在经历了追求体量扩张的“拼规模”和标志性建筑、形象工程的“拼形象”之后，开始越发关注地方文化的内涵，更加热衷于寻找具有代表性并得到居民广泛认同的“地域精神”。

朱有志说，目前中国各省、市对提炼地方精神如此热烈、如此普遍，不仅是受到“北京精神”的带动，更重要的是时代发展的推动力所促成，是国家和民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

不过人们也注意到，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跟进评选，但“地域精神”却遭遇了“似曾相识”的尴尬：某些词汇高频率地出现在各地“地域精神”的表述语中，如创新、开放、和谐、诚信等。

有观点认为，这正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和精神的召唤，是社会主流人群的合力诉求，体现了执政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图。但也有人表示，如果地方精神“千城一面”，雷同甚至教条化、口号化，会让群众失去认同感，很难产生正面激励作用。

张志初认为，“精神名片”的征集和提炼，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充分了解和认识，并发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否则会造成定位模糊、把不准文脉，导致表述语提炼的同质化和趋同性。

也有不少群众向记者表示，倡导者不应只是空呼口号，而应当带头践行，给百姓做出表率 and 示范，这样评选提炼活动才不会沦为一场“秀”。

相关分析人士则指出，在提炼“地域精神”的过程中，唯有去功利化思维和政绩冲动，才能真正让“地域精神”源自民间、回归民间。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将其还原到地方历史的纵向坐标中去考察，也要将其放到同时代其他地区对比的横向坐标中去定位。（2012年03月23日新华社记者明星郭鑫）

城市靠电影、宣传片打造名片

1960年，电影《刘三姐》无意中给一个城市做了个大“广告”，让观众牢牢记住了有秀美山水和动人山歌的广西桂林，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还有电影《阿诗玛》、《五朵金花》以及《庐山恋》。近年来，冯小刚的《非诚勿扰》让杭州西溪湿地成为可与西湖比肩的城市名片，而当

地政府巨额投资的《唐山大地震》更引发关于“城市与电影”的热议……

越来越多的城市争相和电影“联姻”

在业界看来，电影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行业，也就是说，电影的社会影响力大，而票房不一定可观。但是，一些城市管理者偏偏把商业回报也许并不大的电影当成香饽饽，盯上了它的“雷声”那轰隆隆的动静：电影尤其是大片，也可以产生广告一般的效应，而且能以更加艺术、更加柔韧、更加潜移默化的方式，增加城市的美誉度，打响城市的文化和旅游牌。

1986年，由谢晋执导的电影《芙蓉镇》，曾让湘西小村王村成为旅游胜地。此后，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把山西乔家大院变成了闻名全国的旅游景点；冯小刚的《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应该让合作的杭州、唐山市政府十分满意。陈凯歌新片《赵氏孤儿》与山西阳泉合作，当地藏山风景区将建一座名为“赵氏孤儿影宫”的电影院，还将打造“赵氏孤儿藏山忠义文化旅游年”。而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刚一立项，杭州、南京和重庆政府就已闻风而动，希望能够与其合作。

“可以说，影视剧作对游客的旅行决策起着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四川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川说。2001年，《指环王》在全球热映，在影片的拍摄地新西兰，游客的数量连年攀升。有调查显示，每10个外国游客中就有1人声称，是《指环王》把自己吸引到了新西兰。

蜀南竹海景区管理局副局长覃鸿杰也坦言，正是“《十面埋伏》外景地”这一头衔，每年至少为景区带来10%的游客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造就了一个个火热的旅游目的地，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城市争相和电影“联姻”的缘起。某网络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四成的游客表示，会因为喜欢一部影视作品而专程去其拍摄外景地旅游。

政府从赞助商到投资商

地方政府参与电影的投资，最先尝到甜头的是云南丽江。当年，丽江市政府与张艺谋合作《千里走单骑》并负担该片首映的全部费用，向全国展示了丽江的风土人情。此后，名导演的国产大片广受地方政府青睐。眼下，《西风烈》、《新少林寺》等电影的投资方名单上也纷纷出现了地方政府的影子。而《唐山大地震》则被看做是迄今给政府带来回报最丰厚的电影，这是在广电总局的牵线搭桥下，政府资本和电影效应达成的一次完美联姻。除了票房收入的进账外，让《唐山大地震》最大的“股东”唐山市政府更高兴的是，唐山的新名片已经发向了全世界。到唐山的游客就比过去增加了几倍，《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等外媒也纷纷刊

发文章，在热议影片的同时称赞唐山是“浴火重生的城市”。

《唐山大地震》的成功运作，也代表政府植入电影从单一投资介入变成多元结合。影片投资 1.2 亿元，唐山市占了 50%，这 50%并不是纯粹的政府投资，而是采取政府主导，通过唐山广电传媒有限公司筹措资金作为投资主体，进而形成城市资本的形式与其他投资方进行合作。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教授认为，城市定制电影会成为城市营销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尹鸿看来，目前城市营销自己的手段很贫乏，通常就是推出吉尼斯世界纪录，搞各种文化节，争夺名人资源。而现在很多城市注意到，电影是一个重要媒介，而且覆盖人群相对高端。

政府与电影“热恋”也要遵循艺术规律

面对电影与地方政府的这场“热恋”，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出自己的担忧。在他们看来，影视剧制作固然需要遵循经济规律，但影视剧创作毕竟不同于纯粹的商业，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影视剧制作的商业模式也应有其自身的规律。

在业界看来，地方政府与电影合作最大的隐忧是电影质量受到影响。有报道称，杭州市政府要求冯小刚在《非诚勿扰》中，杭州市景区的地点不少于 3 个，介绍景点的镜头不能少于 30 分钟。另外，由于三亚市政府也参与了部分投资，也要求冯小刚必须在片中提到三亚，于是这个发生在北京和杭州的故事中，就出现了在海航工作的女主角，目的就是为了介绍三亚。

据了解，在国内，中国移动、东风日产等企业都曾推出过定制电影，企业以深层植入的角色出现，而非纯粹的投资方。这使得导演、制片方为了满足企业的要求而忽略了市场，最终导致发行受阻。

其实，用电影宣传城市这种有目的的介入，在国外屡见不鲜，从《西雅图不眠夜》到《澳大利亚》再到《午夜巴塞罗那》，这些声名显赫的影片其实都来源于城市的宣传计划。

近年来，中国电影以每年 30%~50%的势头增长，受到了来自行业内外空前关注。其中，地方政府与电影的联姻也成为新的电影现象被业内关注，该现象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大城市固然要以文化论输赢，但利用电影打造属于自己的城市名片，不但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好长远发展规划，也要尊重电影的自身规律。（4 月 11 日长沙媒体论坛）

湖北襄阳：亮出“见义勇为”地方名片

《保定好男儿身中三刀后生擒凶犯》追踪

燕阵·保定消息(记者郭志昆实习记者张卫军)2012年1月13日晚，记者心怀留恋地坐上了由襄阳返回保定的火车。在襄阳为期4天的跟追采访中，襄阳对“保定好男儿”龚龙平的褒奖程度，远远超出记者的预期想象。襄阳市在2011年12月6日刚刚荣获“全国见义勇为城市奖”，荣誉的光环眷顾这座古城并非偶然，在这座古城内外演绎的见义勇为赞歌，从不曾停止过。襄阳市为何如此高度重视见义勇为？这种见义勇为的民风有着什么样的传统？记者在襄阳市经过几天的采访和感受，走访当地市民，采访襄阳市综治办主任王全新和襄城区政法委书记胡程。了解到襄阳见义勇为民风自古便有，襄阳市很好地将其延续了下来，这种延续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铮铮铁骨打造的襄阳

襄阳市位于汉水中游，扼控南北水陆交通的咽喉要塞，地势十分险要，素有“铁打的襄阳”之称。在这片地理概念极强的土地上，仅宋末襄阳保卫战一役中，就诞生过无数的英雄儿女。

在南宋时期，襄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就如同二战时期斯大林格勒之于苏联。南宋末年，蒙古军队灭金后开始图谋中原，这支在亚欧两洲所向披靡的铁骑，到达襄阳时，却被阻挡在城墙外达6年之久。

6年的时间里，蒙古军队修建了大量的城堡、围墙，还建造了5000艘战舰，将襄阳军民死死地围在城内。困守孤城的襄阳军民，为打破被动局面，招得三千死士，以张顺和张贵为首领，准备偷袭蒙古军船只。突袭时，张顺四枪六箭，壮烈牺牲，张贵则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襄阳军民后将二位烈士合葬在一起，修建了双烈祠。

襄阳保卫战虽没有取得胜利，但城内军民在被困时期，那种以硬纸为甲、拆房取木生火的英勇壮举，却成为“铁打的襄阳”的深刻烙印。张先生已年过七旬，是襄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第一批元老之一，现已退休。他介绍说，襄阳见义勇为的民风传统，自古便有。襄阳地处南北交界，见义勇为好男儿既有北方人的豪爽，又具备南方人的细腻。在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下，助人为乐、嫉恶如仇作为民风的一种，被很好地传承下来。豪爽如“保定好男儿”龚龙平，“该出手时就出手”；细腻如感动台州年度人物郑学明，平时就从小事做起细心照顾别人。

17年表彰988位平民英雄

襄阳市历来高度重视见义勇为工作，将见义勇为作为一项城市事业来做。该市早在1995年就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2004年正式成立见义勇为促进会，目前专项资金规模达200多万元。

襄阳市为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将其列入城市法规之中，以法律法规的形式长期固定下来。该市曾先后出台《襄阳市见义勇为有功人员奖励办法》、《襄阳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

保护规定》和《关于提高见义勇为奖励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先进个人的最高奖励 3 万元，最高抚恤 2 万元。

2012 年 1 月 11 日，“保定好男儿”龚龙平被襄阳市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截至目前，该市共有 988 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受到表彰。这些被表彰的人群中，有 5 人获得国家级表彰，34 人受省级表彰，103 人得到市级表彰。近年来，襄阳先后召开见义勇为表彰会 22 场，举办见义勇为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 17 场。此外，在该市的新闻媒体，专门开设见义勇为专栏和专题节目，大力宣传见义勇为事迹。

好男儿遍布五湖四海

“走出去，襄阳人仍是英雄！”2012 年 1 月 13 日下午，襄阳市综治办主任王全新激动地说道。龚龙平的事迹不是发生在襄阳，但襄阳人民仍以他们为荣。襄阳市接受表彰的 988 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中，很大一部分跟龚龙平一样，他们的义举是在襄阳城外表现出来的，其中很多人在异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龚满明是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镇人，曾在部队服役，退役后受聘于异乡西川成都某医药公司任经济民警。2002 年在成都市洞子口五福菜市场遇到两名抢劫歹徒，当即与其进行殊死搏斗，后不幸被刺身亡。

“我就是打工者，也许我穿着破烂，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心里也破烂；我满面灰尘，但心里干净透明……”这是龚满明生前写在日记本上的一句话。

在其牺牲后不久，四川省政府、成都市政府追认龚满明为“见义勇为勇士”、“革命烈士”，蓉城人民誉之为“城市英雄”。全国著名雕塑家严永明自费为其制作铜像，将其安放于成都市金牛区洞子口亲水园广场。

“龚老弟，我是流着泪看完关于你的报道的，你安心走吧，所有好心人都会照顾你的家人。我也是外地打工者，深深知道咱们挣钱的辛酸，汗珠子掉一地才能挣点辛苦钱。现在你的事迹已经传开，我会把你的事向我身边的每一位外地工者讲一遍，咱外地打工者也是高尚的。”一位同样在外地打工的襄阳人在龚满明铜像前，淌着泪说出了这番话，后被襄阳市见义勇为促进会的工作人员记录了下来。

襄阳人在外地见义勇为的先进人物典型，从这座古城走出去的还有很多。襄阳人韦黎在湖南长沙 602 路公交车上，制止小偷行窃时，被扎伤至死；在浙江台州追捕拦路的抢劫歹徒，英勇牺牲的杨吉光，当时他年仅 24 岁；浙江台州徒手接住轻生跳楼女子，被砸伤的襄阳籍保安郑学明……

五大体系推进民风建设

厚重的历史孕育着开放的襄阳。她有 2800 年的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经济发展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在湖北省统计局做的城市安全感民意调查中，襄阳市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达到 90% 以上，居湖北省前列。2011 年，襄阳市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民风建设上重点在五个方面进行推进。

五方面的体系包括党政领导的决策体系化，体现在市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社区公众服务体系化，主要体现在社区对道德模范的关心和关爱上；社会矛盾调解体系，集中处理道德先进个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特殊人群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化，解决诸如精神病人、留守儿童、老年、儿童等特殊人群的后顾之忧；社会公共安全服务体系化，主要体现在对道德先进个人的表彰上。

良好的社会发展体系，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襄阳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期，社会也进入了和谐稳定时期。襄阳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见义勇为风气，见义勇为者层出不穷，人人关心、关爱见义勇为英雄，党委、政府也非常重视，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循环。好男儿龚龙平自回乡那一刻起，便受到了家乡人民的隆重欢迎，虽然他是在河北保定见义勇为，但回到家乡，同样光荣。“在他下车之前，襄阳市领导便安排欢迎队伍在高速出口相迎，而且市委书记获悉后亲自批示，这些都说明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襄阳市综治办主任王全新说道。

不仅关心关爱还要善待厚待

王全新主任介绍，襄阳市见义勇为事业的发展，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很大关系。该市 1995 年开始设立见义勇为基金会，当年就开始奖励先进个人。对于见义勇为人员，一方面要大力弘扬，进行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鼓励；一方面政府会采取关心、关爱见义勇为人员；在此基础上还要善待、厚待他们。“他们在生活中可能遇到困难，也可能会受到打击报复，当出现这些问题时，相比当时的奖励，党委政府怎么解决，显得更为重要。

该市早在 1995 年建立基金会时，就出台了《襄阳市见义勇为奖励办法》；2004 年成立见义勇为促进会时，又相应的出台了《襄阳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保护规定》。当时就不仅仅是精神和物质上对见义勇为人员奖励，而且还要做好他们的安全保障。

该市还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建立爱心账户。被表彰的见义勇为个人，凡有家庭困难者，这个爱心账户就会像工资卡一样，定期地将资助金打到这些经济困难的先进个人账户上。见义勇为者在受伤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相关部门也会解决。

在《关于提高见义勇为奖励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后，被表彰的先进个人所获得的奖金，在原来的基础上，奖金标准增加为 3000、6000、10000 三个级别；见义勇为慰问

标准也相应增加，在年底或春节前对困难人员标准是 2000 到 3000 元，此外还有抚恤标准，有 10000 和 20000 两个标准。2012 年 1 月 9 日，襄阳市综治委、市见义勇为促进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各地在春节前，对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及家属开展一次走访慰问活动。据悉，该市在每年的春节前，都会进行此项活动，除发放慰问金外，还为每名被走访者准备了一封慰问信。

提高襄阳市人民幸福指数

2012 年 1 月 13 日中午，襄阳市襄城区政法委书记胡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襄阳市历来重视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每一个襄阳人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也只有每一个市民都严把道德关，整个城市才会更快现实“文化襄阳”目标。

在襄阳市刚刚召开的党代会上，代表们曾提出了“提高襄阳市幸福指数”的议题。“提高襄阳人民的幸福指数，其中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居民安全指数，只有群众生活有了安全感，才会去考虑其他因素。”胡镗书记说道。

近几年来，襄阳市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教育，开展道德模范的评比和中小学道德教育培养工作。“襄阳市在市民道德建设上，采用奖励和竞争并行的方式来进行，只有全社会都以提高道德为荣，才能调动城市整体社会氛围。”

据介绍，襄阳市襄城区除了提高全区人民的道德观念外，在社会治安方面同样做出了多努力。该区自去年 10 月份以来，一直在全区开展“凌晨行动”，以长期打击的方式减少夜间犯罪事件的发生。“凌晨行动”是指在凌晨 23 时至次日的 5 时，由区内每个居委会、行政村、派出所等抽出一定的人员，对区内的每一个社区、街道等进行夜间巡逻。

襄城区在每一个社区小院里，都要求安装摄像头，目前安装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同时，为了保证巡逻人员尽职尽责，该区相关领导会不定时地对巡逻人员进行抽查。一旦发现有渎职行为，将直接与其工资、奖金挂钩，严重时还将对其进行记过处分。

为了能够群策群力，该区会不时地将社会管理工作要点，发布在政法系统内部网站上，以供相关人员讨论之用，同时积极号召内部相关单位提意见、出点子。“‘四个襄阳’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城市在发展时，需要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精神力量，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襄阳市综治办主任王全新说道。凝聚襄阳那股精神力量，需要干部团队、企业家团队和市民团队三支合力。见义勇为就是在弘扬正气，而弘扬正气就是凝聚力量最好的方式。这种精神力量能带动襄阳整体社会风气的良性发展，从而推动襄阳整体经济的发展。

浙江绍兴：激活文化资源 打造城市名片

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文化要发展要繁荣，其动力不仅来自改革的魄力，更来自发展的果敢。

绍兴市市长钱建民：古为今用，既是传承，更是创新，目的是激活文化之活力。

绍兴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白墙黛瓦、小桥、流水、老酒、越剧……是对外人对绍兴深厚文化底蕴的感性认识。长期生活在绍兴的居民，不仅对老祖宗留下的厚重文化财富骄傲自豪，同时也为日新月异的绍兴文化新貌由衷欣喜和幸福。

传承历史文化，发展现代文明，促进文化与经济融合，绍兴创造了独特的城市名片。本期光明日报《文化强市百城行》专栏走进浙江绍兴。

2月15日晚，浙江省第一部原创歌剧《祝福》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出品者：绍兴县政府与浙江金永玲歌剧院；

去年9月10日，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秋瑾》，出品者：浙江绍剧团；

与《秋瑾》公演同日，绍兴越剧明星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历时3年余，演遍全国，巡演欧美……

近年来，绍兴文化发散着越来越浓郁的芬芳，馨香远溢全国，飘向世界。

早春二月，漫步绍兴，但见黑瓦白墙的江南民居荡漾着一派黛色；精巧的庭院，小巧的门楣，曲径通幽处，蓦然间小院里闪出的竟是国学大师蔡元培，台门里闪出大文豪鲁迅的身影，王羲之、徐渭、秋瑾，一个个大师名家散布古城的角角落落，共同为古城增添浓郁的文化氛围。

浸润着传统文化，沐浴着先人遗泽，他们将文化与经济完美融合：咸亨酒店，孔乙己酒家，祥林嫂绸缎庄，阿Q牌毡帽，鲁迅笔下的人名、地名、物名竟成了品牌，转化成巨大的商业资源！据称已在全国拥有数十家连锁店的咸亨酒店，品牌价值已逾40亿。绍兴城内仅以鲁迅作品里的人物地名注册的商标竟有上千个。

绍兴文化魅力的源泉在于“古”。“绍兴的‘古’有7000年历史积淀、2500年建城史做基层，留存于今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272处，其中国家级16处，省级54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1项。绍兴因此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孟达说。

本世纪开始，绍兴市理性地提出“保护也是一种发展”的理念。为保护古城，还原历史的原生态，该市投入数十亿元，整修了鲁迅故里、仓桥直街、书圣故里、八字桥等历史街区，并创造了我国古城保护继丽江、平遥的“全城保护模式”和沈阳的“单体保护模式”之后的第三种模式——“绍兴模式”。鲁迅故居保护更是堪称典范：将鲁迅故居保护扩大到

鲁迅故里保护，恢复了文物的原生态环境。“绍兴模式”由此成为中国古城保护中代表古城保护方向的一大模式。

古城保护应服务于现实。2005年起，绍兴市确立建设文化强市的战略，大打文化牌：“江南风情看绍兴、江南古城看绍兴、江南文化看绍兴”，挖掘和弘扬以大禹和鲁迅为代表的名人文化，以越都为代表的古越文化，以黄酒为代表的物产文化，以越剧为代表的戏曲文化，以兰亭为代表的书法文化，以乌篷船、乌干菜、乌毡帽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古代现代、有形无形、物质精神因文化而熔于一炉，绍兴的旅游业开始勃兴。

名人是城市的灵魂和旗帜，是文化上的金名片。绍兴的文化无不与该市的名人紧密相联：“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大禹，“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书圣王羲之，“东山再起”的谢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陆游，民主革命家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正是这些名人用人格、精神、作品铸成的文化，才有了今天绍兴的无穷魅力。

绍兴的文化深深熔铸在绍兴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养育出绍兴人勤劳、智慧、敢于创新的性格。绍兴市委宣传部长尹永杰对绍兴人的评价是：“智慧、务实、坚韧、卓越，这就是绍兴文化的魅力。”正是这样的性格创造了绍兴经济发展的奇迹。店口露笑集团总裁鲁小均放牛出身，后创建中国第一家解决涡轮蒸压技术难题的企业，年产值达数十亿元。绍兴海亮集团董事局主席冯海良白手起家，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国，年产值达到数百亿元。

绍兴是“最佳中国魅力城市”，近几年来兴建了大批文化设施，各类文化惠民活动如“文化大巴”、“图书大巴”、“百姓周末”、“绍剧周末剧场”等频繁；送演出、送书、送电影下乡已成常态，有效解决农民群众“看戏难、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

绍兴文化的魅力还表现在近年创作的大批文化精品：出版了《绍兴历史文化之谜》、《绍兴通史》、《绕指柔》等一批书籍；创演《一钱太守》、《李慧娘》、《蔡文姬》等一批越剧和《秋瑾》、《生命的飞翔》等绍剧；拍摄了《越王勾践》、《美丽誓言》、《绍兴：一座名城的2500年》等电视剧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变身男女》、《少年师爷》等一批电影动漫。近年先后有绍剧《大禹治水》、越剧《西施断缆》等9件作品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60余件作品获省“五个一工程”奖，电影《周恩来，伟大的朋友》、广播剧《枫桥民警》等20多部作品获全国各类大奖，有5名演员获“梅花奖”。

近年来，绍兴市委、市政府以建设文化强市为总要求，作出了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创历史文化名城新局面的战略部署。前不久，绍兴市委发布的《关

于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决定》使古城弥漫着更加浓郁的文化气息，绍兴文化强市建设正在加快进程。

“我们现在正处于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的时期。”市委书记张金如说。“我们坚持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大力发展文化经济，精心打造鲁迅故里等文化景点，积极打造全城旅游，积极开发文化产品，文化资源加速向经济资源转变，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本报记者 叶 辉）

专家点评

绍兴市委党校校委委员 杨宏翔

这些年，绍兴的文化建设一直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奋进。绍兴文化强市的目标为绍兴区域文化繁荣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江浙沪”经典越剧大展演、明星版《梁祝》等文化品牌提升了文化软实力；公祭大禹陵、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等文化活动提升绍兴影响力；嵯州艺术村等文化集聚区，促进了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光明日报》）

有一种名片 叫做方言

除了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语言文字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了。方言是一个人随身携带的“名片”，它储存了你所有的信息和秘密。

喜欢说“俺”的山东人，是一个最为迷恋方言的群体。山东话不浪漫，不抒情，不忧郁，没情调，缺点很多。在这个普通话流行的时代，为什么山东人那么迷恋山东话啊？

乡音无改鬓毛衰

方言在山东至今仍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即使离开山东，到外地工作，山东人也仍然说着一口流利的家乡话。从大规模的闯关东开始，山东人把家乡话带到了东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话传遍全中国。解放后，一大批山东籍的南下干部乡音未改。直到改革开放了几十年的今天，山东输送到各地的人才也还说着山东话。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是山东人最真实的写照。

每次出差去外地，只要一坐上回山东的飞机火车汽车，整个空间里就充斥着山东话，熟悉而又亲切。不管是否认识，大家都能聊得火热。方言，就是一片流动的山东土地了。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山东话伴随，我们就感觉脚踩山东的大地，心里就非常踏实，稳定，有一种依赖感。

让我们走进山东人的内心深处，看一看那奇特的心理世界。

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了 2000 多年，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社会心理趋于超稳定状态，害怕变革与进步。齐鲁文化曾经深刻影响过中国，山东人为此骄傲，并表现出一种“守成”心理。

山东是中国农业文明最早成熟的地方,至今山东仍然是农业大省,即使是山东城市居民,也大多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生活方式,夜晚,老百姓的惟一娱乐就是看电视。

与农业文明相适应,孔老夫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山东人喜欢稳定,循序渐进。

而中国社会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就开始了剧烈的变化,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山东人一方面要去适应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寻求精神的依靠与寄托,山东方言就成为山东人的精神寄托之一。它是山东人的心灵庇护所。

四大板块南腔北调

一天,我突发奇想:如果我们还处在孔子时代,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胶东人和鲁西人在一起交流也需要翻译?

因为山东各地的话有差异,所以也闹出一些笑话。网上就流行着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单位来了日本客人,到济南酒店订餐。单位秘书是胶东人,他把日本人说成是“一波银”,酒店听成是 100 人来就餐,觉得这是大生意,就把电话打回这个单位,问每个人是什么标准,没想到是办公室主任接的电话,他是淄博人,一听就急了:不是“一北人”,是“二本人”。他把日本人说成是 200 人了。

在我的感觉中,山东各地市的话都不相同,甚至一个县内的不同乡镇说话也不一样。方言学家钱曾怡、高文达等根据各地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把山东话分成两个大区:西区、东区;四个小区:西齐区、西鲁区、东潍区、东莱区。

我觉得惊奇的是,我们老家莱州的方言本来属于东潍小区,但是却又兼备东莱小区的特点,这在整个山东也是一个特例。

有专家从理论高度论述了保护方言的重要性。在自然界里,有一个环环相扣的生物链条,每一个链条都不能缺少,否则会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灭顶之灾。这一链条在文化界同样存在。

专家说:保护方言和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普通话的很多词汇来源于方言,两者同属一脉,并不对立。方言的使用范围会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而逐渐缩小,保护方言是加强其内在价值的研究整理,与推广普通话并行不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1 年底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每个人都有权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母语来表达思想,创作并传播作品。(大众日报)

“地方名片”背后的发展观

电影《通道转兵》将红军长征期间转战通道县的故事搬上了银幕。倏忽之间，素来默默无闻的通道“出名”了。人们关注通道，并非单单电影宣传所致，而是因为它的一个“大动作”：拍这部电影，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县的通道竟动用了当年财政收入的1/40。

“花这么大代价拍这部片子，一方面是为了重现那段历史，另一方面，影片本身也成为通道旅游推广计划的一部分。”当地一名副县长如是回答。原来，早在几年前，通道县就确立了“生态立县、旅游立县”的发展战略，“红色旅游”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花巨资拍电影，正是这一贫困县打造“地方名片”的一大“创举”。

其实，不仅仅是通道一地。近年来，不少地方都热衷于打造“地方名片”。除了通道那样花巨资做“形象广告”外，一些地方打造“名片”，可谓各有高招。笔者梳理一番，各地“名片”的打造，大致有三张牌：

第一张“更名牌”。早在多年前，盛产普洱茶的思茅市就更名为了“普洱市”；襄樊市也把名字改成了“襄阳市”。更令人惊讶的是，一部《山楂树之恋》热映之后，外景地远安县为发展旅游，竟欲让电影取景的青龙村改名为电影里的“西坪村”，县名则直接改叫“山楂县”。然而更名热之下，原有地名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以及更名本身所带给当地的巨大行政成本，却极少被提及。

第二张“节庆赛事牌”。从各种音乐节、美食节、服装节，到各种极速车赛、自行车赛、马拉松赛等，各地办节办赛一哄而上。热情有余却务实不足：一些小县城办起了“国际贸易节”，一些山城办起了“国际音乐节”，办赛成本高、组织难度大的马拉松赛在国内也已有20多个赛事。而节庆赛事的盈利与否却少有考虑。

第三张“名人故里牌”。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只要是有些“名气”的，都会被一些地方争来，打出名人故里的“地方名片”；甚至是小说中的角色、传说里的人物等，也统统被拿来成为了“地方名片”。

“地方名片”的打造，有利于推广地方形象，有利于带动旅游、促进投资、推进发展。地方政府有着发展经济的迫切心情，重金打造“地方名片”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地方名片”的打造必须要与当地自然、经济条件相符合，与当地发展情况相适应，不能为打造

而打造。说到底，“地方名片”打造的背后，反映了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发展观是否科学，政绩观是否正确。

仍然回到《通道转兵》这部电影上来。通道县通过艺术手段再现革命历史，自然无可非议。但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许多百姓生活尚未脱贫，拿出大把财政收入拍电影打造“地方名片”，无疑显得有些不恰当。靠这样的“地方名片”吸引来的游客、投资客，若发现当地基础设施、发展环境依然十分薄弱，恐怕也不会再有兴趣近悦远来。因此，笔者以为，对于这样的贫困地方，优化发展环境、改善百姓生活，才是最重要、最好的“地方名片”。

这样的道理，对于其他致力于打造“名片”的地方来说也一样。否则，恐怕只能如通道县领导自认为的那样：对于公众的不理解“我们也给予理解”，因为“至少他们关注这个事了，至少把我们的家乡推荐出去了”。这样的话，只能令人叹息……（新华网时政频道陆一波）

精制文化惠民“淮扬盛宴”

公共文化体系日臻完善、文化精品不断涌现、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均GDP超过9500美元的江苏在工业化快速进程中，始终将百姓需求作为文化繁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打造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文化惠民工程，为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奉上一道道不仅吃饱、更能吃好的“淮扬盛宴”，并以此推动了带有浓郁江苏特色的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努力开创江苏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文化惠民，同飨城乡百姓

先去中山陵陵寝，下来逛明孝陵，紧挨着是六朝展览馆，进入中山门，径直去南博，出来再看梅园新村、省美术馆——这条免费游路线图出自南京市民叶霄煜之手，曾在网上引起不小的反响。

叶霄煜自称是个悠闲的“大萝卜”，哪有不花钱又好玩的景点，他脑子里有张活地图，“近几年免费场馆越来越多，地图也得及时修改！”

他的感受没错。近年来，江苏重视文化公益惠民，将“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财政投入重点，人们的文化福利像建地铁、修大桥一样写入了城市规划。

目前，全省“三馆一站”免费开放率逾90%，省有四馆、市有三馆、县有两馆、乡有一站、村有一室；多个城市着力打造“15分钟文化圈”，农村打造“十里文化圈”；到2015年，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将达1200平方米。

普及公共文化设施的根本目的是向公众提供丰富优质的文化服务，“零门槛”让更多人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截至2011年底，中山陵陵寝免费开放的首年接待游客800万人次，是过去年平均量的3倍多。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江苏进一步提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城乡文化一体化要有新突破。不仅消除设施盲点，还要实现网络、阵地和内容的三重覆盖。通过大力拓展网上图书馆、网上博物馆、数字农家书屋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覆盖1000多个社区和1.7万多个行政村。

“江苏经济领跑全国，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也要走率先之路。要把‘国标’当成起步标准，以尽可能高的‘省标’普惠于民。”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化厅厅长章剑华说。

精品迭出，奉上“淮扬盛宴”

苏州滑稽剧团繁忙的演出季近日“渐入佳境”：《一二三，齐步走》刚结束在上海的半个月演出，《青春跑道》《顾家姆妈》又开始进校园、进社区。

一个市属剧团，有3台剧目连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同时活跃在演出市场，是团长徐春宏最骄傲的。“《一二三，齐步走》4000余场，《青春跑道》1600余场，《顾家姆妈》300多场……从市场到赛场，再回到市场，我们力争用最好的作品回馈观众。”他说。

以佳作惠民，苏州滑稽剧团是典范，也是缩影。近年来，江苏坚持多出精品和多出人才互动并进，着力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的“文化苏军”，推出了一批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力作。

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上，江苏53件作品获奖，其中金奖3件，列各省之首；2011年6月，顾芎摘得第六个“梅花大奖”；8月，毕飞宇凭长篇小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9月，江苏投拍的电影《辛亥革命》成为荧屏热点；岁末年初，《金陵十三钗》以近6亿元的佳绩票房夺冠……

“精品集聚群发、叫好不叫座，根本目的还在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最终受益者是广大百姓。”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说。

佳作涌动的背后，是江苏文化惠民产品供给能力的大幅提升。2011年，全省共有19部影片、23部电视剧、4.8万分钟原创电视动画片获准发行；19家图书出版单位出版图书2万多种，同比增长39%。

产业腾飞，开创“黄金时代”

吴江盛泽镇的世纪影城是家乡镇影院，去年票房达200多万。“5个厅中就有2个3D影厅，想看最新大片，不用再跑苏州、上海。”经理计健根说。

据统计，江苏已有影院183家、银幕946块，并且还在以每周1座影院，每10天9块银幕的速度增加，为人们高质量观影提供了极大便利。

随着百姓文化消费步入活跃期，江苏对文化惠民的认识也上升到了新高度：高水平的文化惠民需要文化产业的活跃，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惠民。

2011年，江苏文化产业增加值第5年保持30%以上的增幅。六中全会后，江苏又立下新目标——新兴文化业态比重达60%。新业态催生新的文化消费方式，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凤凰传媒集团的“文化MALL”打破传统实体书店模式，变身集书店、影院、画廊、酒吧、茶吧、培训于一身的文化消费综合体，得到读者喜爱。

江苏有线“云媒体电视”率先上线，含高清、点播、互联网、商场等9大板块，真正实现了“看电视”向“用电视”转变，已在全省推广。

科技加创意，撬动文化产业板块快速崛起。去年全省172个项目获得2.12亿元文化产业引导资金，带动总投资722亿元，其中高科技项目逾70%。全省140多个文化园区发展势头强劲，沿沪宁线新兴文化产业带等几大文化产业带初现雏形。

江苏文化建设工程提出，到2015年，全省文化产业总收入超过1万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6%，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我们完全有信心再创一个经济发展黄金期的同时，再创一个文化发展黄金期。”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说。（4月24日 新华网江苏频道冯诚 郭奔胜 蒋芳）

●新闻导航

人民日报在薄熙来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导读]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称人民日报在薄熙来事件中的相关评论确定了基调，起到统一全党全国思想认识、安定民心稳定大局的作用，显示了强大的舆论引导能力，具有很高的价值，应该能写进政治史、新闻史。



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

今天来，就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些人民日报的情况，人民日报的变化和对未来的想法。希望同学们走近人民日报、认识人民日报、了解人民日报。下面向大家介绍三个方面：

一、人民日报的历史担当：

见证历史发展，推动时代进步。

我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在宽松、多元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网络恐怕是你们的生存方式，你们不太看报，看报恐怕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你们对人民日报可能有一种印象，就是它很刻板。几年前，我们报社一个年轻编辑在网络论坛发帖征集报道线索，结果却被很多网友跟帖嘲笑、挖苦，让他“很受伤”。当然，没能让年轻读者了解人民日报，这是我们的失职。然而，如果这种习惯性的不屑，是因为不看、不了解，是否也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跟风心态呢？我觉得作为未来中国的栋梁和精英分子，同学们不能不知道人民日报到底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办人民日报的，又是怎样的一群人。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发生在我们金台园中的几件事。从这几件事中，大家也许可以初步了解一下人民日报。

近期最受关注的新闻，莫过于薄熙来事件了。在这一事件的宣传报道中，人民日报，尤其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翻开4月11日各地的报纸，不管是党报还是都市报，几乎都在头版转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接下来的两篇评论员文章《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也同样影响巨大。

这三篇评论，是我们评论部主任带着两个“80后”年轻人，在两天之内拿出的。三篇评论员文章之外，我们还在头版的言论栏目“今日谈”中，连续刊发了8篇相关评论。如果说播发消息只是信息通报，那么这些评论，就是确定基调的。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统一全党全国思想认识、安定民心稳定大局的作用。这些报道和文章，既及时公开事态，又适时发表观点，显示了强大的舆论引导能力，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新闻价值和现实针对性，应该能写

进政治史、新闻史。人民日报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很好地证明了，人民日报仍然是我国主流舆论的首席代表。

要介绍的第二件事，是一个好消息。明天（27日），在浦东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网将要鸣锣上市。人民网总裁廖珏讲得好，也干得好，人民网这些年确实发展迅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报网融合”趋势之下，人民日报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大众化借助网络平台凝聚成可观的“文化价值”，这才会有资本市场的青睐。在得到网民的认同之后，又得到股民的认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日报没有自娱自乐、孤芳自赏，更不是无人喝彩、陷入边缘。

最近的人民日报一次外事活动，令人想到一位国外政要评价人民日报的一句话：“你可以喜欢它，可以不喜欢它，可以赞成它，可以不赞成它，但你必须重视它，研究它。”人民日报是中国的第一大报，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影响力考量确定的世界十大报纸之一。在很多驻华使馆，人民日报订阅量很高。有的国外新闻机构驻华记者，要雇专人给他读人民日报。国外的许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都以人民日报为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文本和参照。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人民日报是世界“打量”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人民日报的创新追求：

从单一到复合，从宣传到传播。

最近，报社国际部一位年轻编辑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我们一篇国际评论的网络反响。她发现，在环球网的全文转载下，77%的读者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而微博一个知名账户以140字将该文编辑转载，打乱了说理逻辑，没有纳入关键语句，网友的反应就截然不同，55.4%的持否定态度，跟帖半数是发泄不满，甚至有很多不理性、不文明的言论。这位年轻编辑提出，不能把微博这个阵地拱手他让，要主动出击，建立本报官方微博，推介优秀作品。这份报告我让印成编委成员阅件，并开编委会专门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在进行准备基础上推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一次社内编辑记者培训，有一场讨论同样对我们触动很大。也是一位年轻编辑说，人民日报现在的发行量是280多万份，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多，但是相对而言仍较少。他举出了我们的“对手”：“微博女王”姚晨，粉丝1955万，这意味着，她每一次发言的受众，即便不算微博“转发”后的间接传播，也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

的确，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生态，既要应对传统媒体的挑战，也要迎接新兴媒体的挑战；既要参与国内舆论格局的变革，又要参加国际信息传播的竞争。对人民日报而言，我们工作的着力点，是要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建立现代传播体系。

与构建传播新格局相对应的，是传播观念的变革和创新。

听过年轻人的调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这个调侃说明，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两个舆论场，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而忽略另一个，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都会有失偏颇。2008年，我们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微博)组建时，就提出打通体制内和民间“两个舆论场”，而打通这两个舆论场，传播观念的变革和创新，首当其冲。在这方面，人民日报近年来抓思想、抓深度的探索，最有代表性。

抓思想的突破口，是评论。去年7月，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部”署名，推出一组“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包括《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等，今年又推出“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引来强烈反响。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形成社会共识，赢得社会理解、共鸣，已成为人民日报评论引领主流舆论、疏导公众情绪的主要方式。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批评人民日报不是一流而是二流报纸，因为它不谈理论不谈思想。我们感到如果不在为党立言上有强音，不出思想，不出观念，不出见解，就很难赢得人民日报作为党的言论机关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逐步形成了这样的评论发展格局。这是我们评论发展的路线图：1980年办的今日谈；1989年办的人民论坛；2005年办了人民时评；2010年办了观点版。还有一直以来有着比较强的影响力的任仲平文章、人民日报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何振华文章等等，还有国际评论、文艺评论等各部门各版面的评论专栏。

以“寻找最大公约数”为宗旨的“任仲平文章”。李长春同志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曾风趣地说，要见见“任仲平同志”，向“任仲平同志”问好，其实，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每一篇任仲平文章，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在抓深度方面，近年来人民日报也有不少名牌栏目、代表作品。

几天前，美国尼尔森发布了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在整个亚太地区，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了正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因此，有专家称，中国不少网民患上了所谓的“坏消息综合征”。

我们感到，为弱势群体张目，为社会良知呐喊，值得鼓励，但是，“偏好负面新闻”未必能有效促进问题的解决，真相有时也会在“坏消息效应”中迷失，“习惯性的质疑”可能会伤害推动社会前行的正面力量。这种社会情绪下更需要主流媒体的作为和担当。

由此，2011年1月，人民日报推出了一个“求证”栏目，以严谨翔实的记者调查，聚焦新闻事件，对一些不实传闻给予澄清。比如最近的《哪些国家提供了免费医疗》，关于这个报道当时人民日报发挥驻外记者的作用，从而澄清“全世界只有20多个国家没有实行免费医疗”的传言；再比如《“月薪万元缴税6600元”说法不准确》，则在个税调整关键时期，为百姓算了细账，指出传言中的常识性错误。

在碎阅读的时代，要给出更完整的信息；在浅阅读的时代，要给出更深刻的思想——这是人民日报这些年来新闻探索的心得。我们的理论部有“六个为什么”、有“任理轩”文章，专业部门有以农业现代化道路为代表的大型综述和各类民生的政策评述，栏目有“人民观察”，在座的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主任曹焕荣是这个栏目的“总设计师”，带有探索性质的。还有“热点解读”“政策解读”等一系列深度报道专栏。有影响的深度报道这些年也越来越多，仅是同学们比较关心的教育、就业等话题，就有《五问中国教育》，《谁在逃离北上广》、《逃回北上广》等。

同时，舆论监督报道也是人民日报的亮色。这是近年来人民日报的一系列舆论监督报道，有《不该发生的事故为何发生》，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追问“7·23”事故；《云南体育比赛为何乱象频出》独家披露体育比赛背后的利益驱动，直接促成了当地的专项整改……《人民日报》从来就不是“幸福报”、“赞歌报”，人民日报老社长范长江对报社同仁说过这样的话：“人民日报应当是目光四射、机动灵敏的思想斗争工具。对于任何错误倾向不加批评，就没有尽到人民日报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人民日报的同志没有失职。

人民日报在传播理念和方式上的追求，也可以表述为两句话“在风云激荡中引领思想，在众声喧哗中回应民意”。

三、寄语与希望：

发现我们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品格。

今天来跟大家交流的最后一部分，想与同学们探讨一下：在我们的时代，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素养和职业素质？在今天办一份主流报纸，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格？讲三点心得，与同学们共勉。

1. 面对众声喧哗，打造恒定的价值观。社会转型期，也是体制转型和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各种矛盾凸显期。在互联网上做个“愤青”相对容易，“愤青”的存在恐怕在现在也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年轻人需要保持对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痛感和批评能力，但13亿中国人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的新生代同时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与党和政府一道，

与全体公民一道，来改革和完善我们的体制机制，以脚踏实地的理想、持久稳定的价值，来推动国家民族的进步。

2. 面对急功近利，磨炼沉稳的职业观。现代社会，需要宽广的知识结构，复合型的从业技能，职业化和专业化是职场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强基石。面对急剧变化的舆论场，新闻工作者同样如此，需要坚强的党性人民性，也需要才气灵气。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有很多名记者、名编辑、老报人。有的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记者，即使做领导了，还喜欢常年在基层奔波，以实践为课堂，拜人民为老师，视新闻为天职，这样的职业观，值得我们学习。

3. 面对浮躁偏激，塑造大气的世界观。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若想位居主流，就得做互联网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做网络偏激情绪的缓释剂，做国民心态的压舱石。这是主流媒体应尽的责任，应有的气度。我们追踪网络帖文，但不能做网络帖文的印刷版；我们关注网民意见，但同时要为网民提供专业判断。办报和做人做事一样，都需一份社会责任、社会关怀，都要有一种大家气象、大家风范。（2012年04月27日。张研农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根据人民网文字实录整理而成，有删节）

●历史深处

关于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的新考证

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35年。35年来，事情的真相和细节一直为人关注，为人乐道。当年惟妙惟肖的传说，后来变成绘声绘色的戏说。关键在于，官方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未必是有意保密，因为那是一次政治风险极高的高层权力变更，所以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相关当事人的叙述便显得颇富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当事人回忆、传记、年谱的公开和出版，以及媒体的采访，以往的传说和戏说很多得以纠误，事情的真相不少也得以澄清，但也留下了一些模糊不清或相互龃龉的疑点。



当年在法庭上受审的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资料图）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去一般说是叶剑英。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事情可能要分为酝酿和正式提议两个阶段。还在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已经与一些当时被边缘化的党政军元老交流过对时局的看法，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等人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向叶表示了对“四人帮”可能控制局面的担忧，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叶则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此的态度和决心。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酝酿。

但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又是一回事。近些年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弄清楚了正式提议的经过。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都说明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的。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9月18日）后，也曾直接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来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中旬或21日。看起来，两者似乎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至于华叶密谈的具体内容，由于两位都已故去，已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如何谋划解决“四人帮”问题，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如何谋划的？以往的说法，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吴德口述，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不知情外，其余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了解此事。吴德还称，其中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都是华国锋本人亲自约谈的，只有倪志福是吴德受华的委托打的招呼。

汪东兴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汪在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也不公道。虽然汪迄今从未公开忆述此事，但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汪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国锋回忆，他除了同叶直接商谈外，还找了汪东兴谈话，汪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华没有透露与汪商谈的时间，但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生前叶就曾同汪交换过彼此看法。果真如此，汪就是分别从华、叶处得知这个动议的。至于详情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有待汪本人的披露。

以往人们都以为一开始就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抓捕的办法，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透露出一个情况：在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共识后，曾经有过另一种考虑，即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华国锋、李先念回忆，9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华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室碰过一次头。吴德建议，用开会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质疑，还举了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说明。华、李、吴权衡再三，考虑中央委员会有不少是“四人帮”拉进来的造反派成员，用开会的办法恐怕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故开会之策弃而不用。不过，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仍有不同记忆，华、李说是9月16日，而吴的记忆是9月26日或27日，两者相差了十来天。

据华国锋说，他不只是找了上述几位政治局成员商议解决的办法，更重要的还同叶剑英多次商量过此事。遗憾的是，华没有透露他同叶商谈的详情，因此华叶之谈仍是未解之谜。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当事人的回忆逐渐相对全面地复原了历史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的说法一直比较含糊或者片面。当事人的回忆逐渐相对全面地复原了历史。据华国锋、吴德的谈话或口述，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华、汪、李三人分别商谈，由汪、吴组织实施的。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又分为三个部分，中南海内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毛远新的行动由汪东兴负责，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舆论单位的行动由耿飏负责。为此，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五十来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关于准备工作，实际上还有一条线被人们忽视了，就是高层经由叶剑英同一些军方人士和党政军元老打了招呼，如李德生、张廷发和聂荣臻、陈云、邓颖超等。从某个角度说，这些也是一种准备，特别是同李德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司令员）打招呼，更是对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预设。

至于具体行动的经过，当事人的披露比较详细。这是近些年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张耀祠、耿飏的回忆录，特别是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陈长江、杨正泉、保育钧等人的访谈，都相当细致地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丰泽园内抓捕江青、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过去一直不清楚。吴德在口述中作了叙述，但仍嫌笼统，远不及对中南海内行动叙述详尽。

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新史料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环。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至于经过，则不知其详。吴德口述最早作了比较详细的忆述，周启才的口述则更为详尽。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作为工作人员旁听会议的是李鑫和周启才。会议从6日晚上十点开到7日凌晨四点，时长六个小时，主要是由华国锋、叶剑英通报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然后作出了关于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之后，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作出了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华国锋曾提议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则坚持谦辞；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建议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认为这时的文件不可能解决“文革”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吴德的口述还是周启才的回忆，对会议安排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情况均寥寥数句，语焉不详。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旁听者），仅有四位尚健在。更进一步的情况，还待当事人披露。

相关链接

参与的当事人分为四个层次

从相关回忆和口述看，参与粉碎“四人帮”整个事件的当事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李和吴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有参与，或者知晓。第二个层级是组织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武健华、吴忠和耿飏、邱巍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部队官兵。

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相关文件起草者亦参与了事件，对情况了解甚多，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相关著述最值得重视。（《北京日报》）